

蒲衣子丛书

陈少明 / 著

等待

刺猬



上海三联书店

蒲衣子丛书

陈少明 / 著

等待刺猬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刺猬/陈少明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ISBN 7-5426-1872-5

I. 等... II. 陈...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8129号

等待刺猬

著 者/陈少明

责任编辑/倪为国 艾 卉

装帧设计/人之初工作室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4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940 1/16

字 数/120千字

印 张/14.25

印 数/1—4100

ISBN7-5426-1872-5

C·49 定价:21.00元



目

录

上篇 问学

等待刺猬

——当代学风的一种思想史分析

- 一、洋典故的启发 5
- 二、世纪的转折点 8
- 三、“主义”领先 13
- 四、新史学：刺猬得势之后 19
- 五、仍未得道 25

论比较哲学

——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

- 一、从比较哲学到中国哲学研究 33
- 二、跨文化沟通 39
- 三、方法论问题 45

知识谱系的转换

——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

- 一、“哲学史”这学问 55
- 二、做翻案文章 61
- 三、正统与“合题” 69
- 四、意识形态的更叠 75
- 五、回归“内在解释” 82

穿越理解的双重屏障

——关于本杰明·史华慈的思想史观

一、思想：“有限的自由” 89

二、分享跨文化的经验 93

三、情势与理路 99

四、对比的观点 104

下篇 说儒

自然

——从思想史到生活方式

一、观念的河流上 115

二、人伦日用之间 122

三、政治与意识形态 132

四、若干评论 140

遭遇自由

——从徐复观看儒学对自由主义的反应

引言 147

一、政治儒学的重建 149

- 二、从“积极自由”看“内在自由” 154
- 三、儒学与人权 163
- 结 语 169

道德重构中的制度与修养问题

——兼谈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

- 一、焦点：公德危机 173
- 二、制度防线 177
- 三、人格修养的文化资源 183
- 四、哲学讨论 188

现代“德治”如何可能？

- 一、一种古老的政治信念 197
- 二、法律的道德价值 202
- 三、道德评价与法律规范 207
- 四、再论德治 213

后记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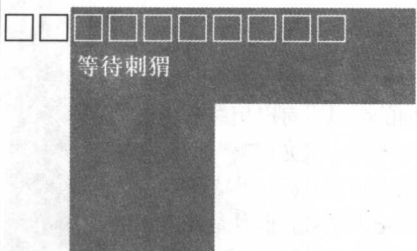
上篇
问学



□□ 等待刺猬

——当代学风的一种思想史分析

■ 移用以赛亚·伯林“狐狸”与“刺猬”的分析，去观察80年代所谈都是大题目，所论均为大方向的学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满街都是刺猬”。以学术史的眼光审察，这无疑“空疏”或“不规范”。但从思想史角度分析，其表象背后，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不仅是世纪末现象，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相交织的问题。本文将在分析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它的是非得失。



等待刺猬

一、洋典故的启发

伯林的比喻源于古希腊诗歌中的一个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对于这句难以索解的话，这位英国思想家用微言大义的手法，充实其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分析思想人物的学问性格上来，其个案就是写《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伯林的笔下，“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现象采取一种整体把握的立场。具体说，就是将其所理解、思考及感受到的内容归结到单一的见解或中心原则上，致力于编排一以贯之的理论系统。任何零散的现象都需纳入其框架才能显示意义。“狐狸”则不然，目标不见得大，但可以多方面追逐、猎取。不同的成果可以没有联系甚至不完整或自相矛盾，其思想方式是离心而非向心的。伯林认为，有些人物性格类型很鲜明，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分别就与刺猬和狐狸对应；但另一些人，如托尔斯泰则不然。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但他却相信自己在

做刺猬。他的天赋和成就是一回事，而他的信念和后来对他的成就的解释是另一回事。《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这种误会或者“角色错位”，正是19世纪大体系的思想风气对托氏影响的结果。^①

鉴于这种说法的启发性，余英时教授将其移用到中国思想史的分析上来。不过他的对象不是20世纪，也不是19世纪，而是18世纪，即对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上。那是乾嘉学术——即考据学鼎盛的时期，或者说是狐狸当道的时代。那个时代评价学问造诣的标准领域是考据，不善于或不屑于此行当，都会被排斥于主流学界之外。而余文中的两主角，却分享着不同的命运。章学诚是生在狐狸当道的时代而坚持自己本色的刺猬，故即使有天纵之才，也只能终于寂寞之中。戴震则不同，在那个时代就被推许为群狐之首，自然很风光。然而，作者要说的则是，戴震并非一只单纯的狐狸：“东原似乎从来不甘心把自己认同于‘狐狸’，然而长期处在‘狐狸’的包围之中，却使他不能不稍稍隐藏一下本来的面目，有时甚至还不免要

^①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Fox", in *Russian Thinkers*, reprinted in Penguin Books, 1994, p.22.

和‘狐狸’敷衍一番。这样一来，就更使同时的人捉摸不定戴东原其人其学的真相了”。^①就是说，这是一只伪装成狐狸的刺猬。戴氏与托翁，情形恰好相反，只不过托翁是误会，戴氏则是“作伪”。余氏的分析，本是为说明清代考据的繁荣正是宋明理学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从而论证其“儒家智识主义”在清代兴起的必然性。把两只刺猬当作狐狸时代代言人的恰当性，这里不能加以评论，但其分析框架，则可作为我们进入20世纪学风讨论的方便法门。其启发性在于：

其一，人们可以看到学风不仅同个人的气质有联系，同时也跟时代风气有关联，即学风具有时代性，它对该时代多数人的治学方向有范导作用(包括对异趣者形成压力)。其二，如果我们同意“近代治学术思想史的人主要是以义理为评判学术成就的标准”^②的判断，那就意味着准备承认，20世纪是刺猬取代狐狸中心地位的时代。其三，刺猬与狐狸是相对而言的，其指陈必须在特定的背景中定位。沿用这个框架观察20世纪，不能局限于义理与考据的对立中，而必须寻求更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或学术现象。这一切，既得追溯纵向的历史根源，又需考察横向的社会背景。

^①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5年，第87页。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页。

二、世纪的转折点

18世纪狐狸当道，而20世纪刺猬得势。但横亘在两个时代之间，还有一个同样漫长的19世纪。它是狐狸与刺猬交接的过渡期。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可以看做刺猬登台的前奏。这个学派的宗旨是通经致用，其开创者为庄存与、刘逢禄，而最能表现经世热情的是其后继者，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从思想史看，新今文经学是儒家经学三型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三型就是分别以今文、古文及宋学为代表的经世、考据及义理之学。用现代术语讲，三者分别体现了政治、历史及哲学的不同特征。这三种形态的发展是经学的内在矛盾同社会政治的演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但明末清初以后，又出现依次为宋学、古文、今文的倒卷帘式的回潮运动。当今文经学再次出现时，实际上是要回到其原始基地——董仲舒奠定的经世之学上。^①

^① 参阅拙著：《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及《被解释的传统》（与单世联、张永义合作，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的部分论文。

新今文学派推崇董仲舒，高谈公羊三世说，讲究历史运会之类，从学风讲都有刺猬的性格特征。这是思想家面对社会危机的时代性反应。就龚、魏而言，龚氏本从其外祖父、戴震的传人段玉裁学《说文》，受古文学的训练。后来宗今文，谈经以讥评时弊为特色，呼吁变法，实是受时政刺激的结果。魏与龚并誉，除《书古微》、《诗古微》讨论经籍，在学术上为今文派张目外，也是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①从龚、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刺猬意识的出现是同变法的愿望，即对整个价值系统的改造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但是，龚、魏都想以复古为变法的途径，表明在那个时代的局限下，他们想做的只是老式的刺猬。真正大刺猬的出现，要到那个世纪末。

不消说，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一号的思想人物要数康有为。他集今文之大成而将其余力发挥到尽头，真正做到“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不论《新学伪经考》的疑旧，还是《孔子改制考》的维新，一破一立，焦点都指向整个价值体系的合法性重建上。而那“秘不示人”的《大同书》，更是对未来人类生活作通天眼式的展示、安排。康氏那笼罩全局的眼光，真正具有刺猬的胃口。

康有为的思想事业，既有其个性的作用，也是时代变局

^①《魏源集》（上），《刘礼部遗书序》，中华书局，1976年，第242页。

使然。梁启超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坚实之基础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①学风如此大胆，武断，然也有众多的追随者，可见已是世风所趋了：“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治；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②谭嗣同闻“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学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③其《仁学》更是天上人间、前生来世、科学宗教、中学西学一锅煮，大有吞云吐雾的气象。康氏重建合法性的努力未成功，但对旧价值系统的根基却掘下了最先、最深的一锄。此后，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刺猬角逐的时代便来临了。

对20世纪学风影响更直接的其实是梁启超。梁的自白很有意思。一方面，“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移于他业，则又抛弃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节。

② 同上。

③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42页。